

翟理斯译介中国文学的路径与特质

宋梦珂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 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主体, 从“译什么”到“怎么译”不断做出个人抉择。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是由外交官转为汉学家的典型人物之一, 在中国文学、文化典籍译介等方面成就斐然。从清末、维多利亚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 考察翟理斯译介选材的特点、“忠实性叛逆”的翻译策略及如何通过“副文本”降低作品异质性, 进而探究翟理斯作为翻译主体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适应和选择, 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有力借鉴。

关键词: 翟理斯; 中国文学; 译介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0. 016

引言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是英国著名汉学家, 先后英译了中国小说、散文和诗歌, 他编译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尝试全面翻译中国诗歌的汉诗英译选集, 其翻译的《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是长期以来流传最广、评价最高的译本。此外, 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学及文化的著作, 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概貌, 是 19 世纪以来英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杰出成果。

在早期英国汉学界, 中国文学作品常被视作语言学习、西方价值传播的工具。尽管翟理斯最初接触中国文学时, 不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动机的影响,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 并形成个人独特的诗学见解。因此, 翟理斯的翻译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主体意识。本文从翟理斯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 探究翟理斯在翻译实践中就“译什么”和“怎么译”的环节如何进行适应与选择, 以期揭示其翻译活动背后的复杂考量, 进而为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译者的“现身”: 底本的选择

翻译过程是个选择过程, 是由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的, 而翻译目的又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 世纪, 在“西方中心主义”操控下的作品中,

中国人被丑化成为一个道德败坏和堕落的民族。然而, 翟理斯在中国长达二十余年的侨居经历, 使他敏锐地察觉到, 中国人“是一个勤劳、清醒并且快乐的种族。”^[1]而“中国社会之所以遭受不公正的指责和嘲笑, 其根源在于西方媒介对中国形象的扭曲。”^{[2]15}因此, 翟理斯选择通过文学作品“允许中国人自己言说自己”, “唤起人们对中国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哲学以及风俗习惯更为广泛而深厚的兴趣”^{[3]173}试图纠正“扭曲”的中国形象。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选材, 根据这一翻译目的, 翟理斯选材时挑选能够展现中国风俗民情的作品。例如, 为了纠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翟理斯特意选取了《中国笑话选》(*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 并在前言中指出: “本书的旨趣在于展现中国人机智幽默的风采……此外, 这些笑话亦能生动映射出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以及中国各界人士, 无论男女老少的行为举止、言语表达与思想观念。”^{[4]2}出于同样的目的, 翟理斯还选择了《聊斋志异》进行译介, 并在译序中称“唯有通过阅读此书, 读者方能深入理解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风貌。”^{[2]15}可见, 在选择“译什么”时, 翟理斯始终将向西方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作为自己译介选材的出发点。

翻译选材不仅受到译者个人目的的影响, 还受到目标语文学的主流诗学影响。翟理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 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 英国社会渴求中国信息。与此同时, 当时的文学创作普遍强调道德教化, 形成了重视伦

理价值的诗学风尚。在这一主流诗学下,为了满足英国读者对于异国的探索欲望,翟理斯倾向于选取情节跌宕起伏的作品进行翻译。在谈及为何选择《聊斋志异》进行翻译时,翟理斯在序言中便提及《聊斋志异》情节的奇异与新奇:“小说包含了道教之异术妖法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奇异故事,其叙事精美,展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各种奇幻世界。”^{[1]xxi}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契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此外,翟理斯从《聊斋志异》中选取《瞳人语》《劳山道士》《画皮》等九篇收入《中国文学史》,这些故事均以扬善惩恶为主题,体现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这与当时英国小说创作注重社会道德的风尚相一致,顺应了时代需求和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

2 译者的坚守:“忠实”的翻译路径

在翻译实践中,翟理斯“始终将文字置于视野范围之内”^{[5]v},这是他对原文文字的“忠实”。同时,翟理斯也曾引用托马斯·莱尔的话“还有什么工作比‘移植外国的思想更高尚’^[5]来表明忠实还原原文思想的重要性。在翟理斯看来,译文“忠实”的标准“就是要让读者明白译者说的是什么。如果读者看不懂译文,那么译文就不正确。”^{[6]34}由此可见,对翟理斯而言,“忠实”不仅有面向原文意义的忠实,也有面向读者的动态“忠实”。

为了追求这两个层面的“忠实”,翟理斯并未拘泥于原文的既有框架,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只要能更好地体现他心中的“忠实”,便是他所青睐的路径。比如翟理斯在翻译《镜花缘》(*The Ching Hua Yuan*)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两书生敬服良箴”时,将中国的“风水”一词便直译为“Feng-Shui”,原因是因为在西方并无“风水”一说,直译的方式保留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异质性”,是对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忠实回应。同样的情况在翻译《洗冤集录》(*The Hsi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ner*)时亦有体现。在翻译如“抓子”“流星”等具备中国特色的兵器时,翟理斯便根据自己的认识,先将兵器的字面意思直译为“iron hands”“shooting star”随后又在括号中进行简单解释,“shooting star [i.e., a piece of iron at the end of a string]”。这种直译加简单解释的方式减少译文读者在阅读时中

所产生的陌生感,助力读者顺利阅读。

尽管“直译”和“意译”都是实现“忠实”的两种途径,但“直译”容易造成“原文的生机、感染力以及那难以言喻的韵味消失得无迹可循”^{[7]149-150}的情况。因此,鉴于“直译”之短,翟理斯更倾向于“意译”。他曾对《红楼梦》书名的直译“Dream of Red Chamber”进行批评:“尽管书中详尽地叙述了多场梦境,然而没有一场与红色卧室有任何直接的联系。”^{[8]52}因此,相比于“Dream of Red Chamber”这一译名,翟理斯认为,用象征“权势和财富”的词“Dream of Wealth and Power”更贴切。可以看出,与直译书名相比,翟理斯更倾向于忠实于故事内核,重新构思书名。

此外,采取意译也让翟理斯在语篇上跳出原文的束缚,更能忠实原作的“神髓”。下面以《镜花缘》为例。

原文:“老叟躬身道:‘原来三位却是天朝大贤!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请进献茶?’”^{[9]81}

译文:.....on learning that they had just arrived from China became anxious to shew them some hospitality.....^{[10]175}

此句选自《镜花缘》第十二回,多九公三人在前往“大人国”的路上,偶遇一寺庙老叟恭请多九公三人进庙喝茶的场景。原文中的“老叟躬身道”“何不请进献茶?”体现了老叟的恭敬态度,这在译文中通过“became anxious to shew them some hospitality”来体现。虽然“躬身”这一具体动作没有直接译出,但“anxious”“hospitality”传达了老叟急于表示好客和尊敬的情感,这是意译的核心所在。

可以看出,不论是选择“直译”还是“意译”,翟理斯始终坚持的是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服务好读者,实现原文、读者的双向忠实。

3 译者的“叛逆”:对原文的改写

翻译中,译者因个人目的和环境影响使译文偏离原文,这一过程即为改写。翟理斯本人也承认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改写在所难免:“……而另一些时候,原作表述冗长,却与前者精炼的文笔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我又不得不进行压缩处理。”^{[5]v}可见,在翟理斯看来,有时为了契合目的语规范和迎合读者阅读取向,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丢失掉一些东西。

而两种语言之间,最易造成文化误解的便是文化意象的差异。在翻译中,若难以正确领会意象背后的意义,便很容易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此为了适应目的语读者,翟理斯在处理文化意象时往往采用意象替代的适应性改写方式。如《聊斋志异·莲香》一文中,原文以“倾国之姝”一词刻画了狐女莲香的美貌。在翟理斯的译文中,他并未直接翻译该词,而是借助荷马史诗中倾覆特洛伊城的美女海伦(Helen)作为意象,以此替代“倾国之姝”。实际上,翟理斯对《聊斋志异》原文中诸如“倾国之姝”“鲍叔”“曹丘”等富有文化色彩的词都进行了替换,以此削弱译文中的异质感。中国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因此很多人认为“诗歌不可译”。翟理斯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尽管诗歌中的意象具有高度的文化特异性,但通过创造性的改写,这些意象可在另一种语境中获得新生。如李白诗《古朗月行》中的最后一句“忧来其如何,惻怆摧心肝”,翟理斯将其翻译为“I wept to lose my favourite thus, and cruel grief my eyelids stained”,^{[10]71}他从《圣经·约伯记》中借用了其中的“哭泣”“弄脏”“眼皮”意象,令译文更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除了在文化上有所差异之外,其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因此,翟理斯对有关道德观念方面的删改也格外留心。如在《聊斋志异·莲香》中,翟理斯将“‘妾莲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楼故多,信之。息烛登床,绸缪甚至。自此三五日辄一至。”^{[11]220}这句翻译成“.....her name was Lien-hsiang....she had long been anxious to make his acquaintance....she used to drop in ...for a chat.”^{[11]106}对比译文可知,翟理斯对原文中的性描写、甚至所有与风月场所有关的专属称谓都进行了彻底的删改。不仅“妓女”与“青楼”等字眼被悉数剔除,就连两人“息烛登床,绸缪甚至”的亲密场景也被淡化翻译为“make his acquaintance”,显得颇为含蓄。此外,翟理斯还刻意对原文信息进行了“误读”,将“三五日辄一至”所隐含的频繁造访之意,译作“for a chat”,从而巧妙地净化了原文中蕴含的性暗示。

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翟理斯所处的英国,社会深受严苛宗教教义的束缚,对于性这一话题较为敏感。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翟理斯选择删减原文中的性描写这一“叛逆”行为,符合当时语境的道德要求,是翻译文学在边缘地位下的一种无奈而必要的策略选择。而其《聊斋志异》的多次再版,也从侧面印证了翟理斯“英语化”改写的可行与成功。

4 另一条通路:副文本的运用

副文本,作为与主文本相互补充的重要元素,对作品的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翟理斯译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认可,与其运用副文本的策略密不可分。

首先,是译序的撰写。在翟理斯的译作中,几乎每一个译作之前都有译序的出现。他经常借助译序阐释翻译动机,说明翻译策略和方法,同时对中国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者进行评述,回应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如在《聊斋志异》的译本序言中,翟理斯批驳“中国自身的声音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被直接忽略”,并赞赏小说语言的精炼,誉之为“是中国小说的典范”。^[12]在《佛国记》(*The Travel of Fa-hsien,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重修版的译本序言中,翟理斯以同样的方式在序言中阐明了对《佛国记》的欣赏,希望读者“能充满乐趣地与法显一起踏上伟大旅程”^{[13]xiv}可见,在翟理斯的译作中,译序成为了帮助译语读者了解译本的“言外之意”。

其次,在翟理斯的译本中,注释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真实呈现中国社会风貌,翟理斯便借助注释,在其中加入了许多他对当下中国社会情况的真实观察和评价,进而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译作内容。仅在《聊斋志异》译本中,注释数量便多达759条,翟理斯对文中出现的有关历史人物、器物、传统节气、制度典籍、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专有名词,通过脚注的形式进行解释说明,有时甚至会直接引用西方的观点来作为补充。如在《陆判》一篇中,文中提到对于那些豁达的人来说,生死并无本质区别。翟理斯便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述,给出西方相近的观点:“对死亡的恐惧,实则源于想象力的虚幻,它让人错误地感知到,仿佛自身依旧存活,而他人却已离世。”^{[2]101}又如在《莲香》中,原文对公鸡啼鸣声消失的描述,翟理斯则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关于公鸡的描写;在

《陆判》中，提到豁达之人并不将生死视为根本区别，则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观点，以此来增强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

最后，翟理斯译本中的注释还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翟理斯通常以一个“字”或“词”为“触发点”，拓展到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描述。如在翻译《镜花缘》时，翟理斯以“船”为切入点，认为这一习俗象征指引方向，并指出西方商人为迎合中国雇主也采纳了这一做法。在《镜花缘》的节译本中，翟理斯所添加的注释共计仅十条，然而其中五条皆是他通过对“词”的阐释而拓展开来的，如“风水”“蔽舍”“标价”等。由此可见，在翟理斯的译本注释中，译者个人的解读印记颇为显著。

5 结语

翻译任何作品时都会进行一种选择。在这之中，译者是进行选择的主体，对译介选材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实则便是对译者本人的进一步了解。翟理斯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汉学家，没有利用翻译去求证西方社会对中国已有的成见，而是在不断选择的翻译过程中，通过译本传达正确的中国形象。对翟理斯翻译选择的研究，启发我们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引起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Giles, Herbert Allen. 1876. *China Sketches* [M]. London: Trubner & Co.,. Ludgate Hill. Shanghai: Kelly & Co.,.
- [2]Giles, Herbert Allen. 1880.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M]. London: Thomas De La Rue & Co.,.
- [3]Giles, Herbert Allen. 1925. *Autobiographical* [M].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 [4]Giles, Herbert Allen. 1925. *Quips from a Ch*

inese Jest-book [M]. Shanghai: Kelly & Walsh: Preface.

- [5]Giles, Herbert Allen. 1884.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London and Shanghai: Kelly & Walsh.
- [6]J. C. Ferguson. 1935. Obituary: Dr. Herbert Allen Giles [J].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0).
- [7]Giles, Herbert Allen. 1881.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J]. *The China Review* (3).
- [8]Giles, Herbert Allen. 1885. The Hung Lou Meng [J].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 [9] (清) 李汝珍原著. 2017. *镜花缘*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10]Giles, Herbert Allen. 1898.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C]. London: Bernald Quaritch;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 [11]Giles, Herbert Allen. 1877. A visit to the Country Of Gentleman [J]. *The China Review* (3).
- [12]蒲松龄: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张友鹤辑校. 1962.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 [13]Pu Songling. 1926.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M]. tr. Herbert A. Gil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 [14]Giles, Herbert Allen. 1923. *The Travel of Fa-hsien,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M]. London: Cambridge.

作者简介：宋梦珂（1997-），女，安徽亳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